

张振国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

张振国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 / 张振国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506-0132-1

I. ①晚… II. ①张… III. ①志怪小说—文学研究—
中国—清后期②传奇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清后期③志
怪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民国④传奇小说—文学研究—
中国—民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5755号

书 名 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

著 者 张振国

责任编辑 樊 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桥北路京新村 546 号 邮编:210031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29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132-1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8849828)

序

李剑国

中国文言小说史的研究及作品的整理,鲁迅是奠基人,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与《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这些开山之作,已经成为经典。《中国小说史略》着眼于整个小说史,但鲁迅对文言小说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他描述出整个文言小说发展的基本线索,尽管涉及作品不是很多,但提出的一系列相当精辟的论断,至今仍不失其理论生命和指导意义。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几十年过去了,此间虽不时有学者涉足文言小说领域,但总的来看,文言小说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与通俗小说研究车水马龙的热闹相比,文言小说研究简直是门可罗雀,研究论著不多。而文言小说的实际情况却是,论时间,它比白话通俗小说的历史早一千多年;论作品,自战国迄民国,单篇丛集加起来成千上万,谓之“汗牛充栋”殆不为过;论影响,它对白话小说、戏曲乃至宗教、艺术、民俗文化等都有着重大深远的注入和启发作用。一部中国小说史,包括文白两部分,缺了文言,大唐帝国就变成南宋的半壁江山。对它不给予充分重视,小说史的描述就是残缺不全的。即便就白话小说研究而言,离开文言小说许多事情也就说不清楚。

正是有感于此,也是出于对鲁迅先生的钦慕,上世纪1980年,我开始了对文言小说的研究,先是研究唐前志怪小说,其后继以唐宋。依我对文言小说的文体分类看法,唐前分为志怪、志人、杂事及杂传小说(单篇),唐以后主要是志怪、传奇和杂事小说。此中杂事小说主要是记载历史遗闻、人物轶事,纪实性强,历史品格往往

大于小说品格,而且愈往后愈甚,因此唐前我主要关注于志怪和单篇杂传小说,唐后则主要是志怪和传奇。

从1984年出版《唐前志怪小说史》,1986年出版《唐前志怪小说辑释》,1993年出版《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1997年出版《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到2001年出版《宋代传奇集》,2005年出版《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2007年出版《新辑搜神记 新辑搜神后记》,此间历时20多年。20多年才弄到宋金辽,不是我懒惰,或者太笨,而是因为研究对象太丰富太复杂了。一个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大量的文献需要发掘、考证和梳理,仅这一项就耗时费力。而我一向崇尚程毅中老前辈倡导的“打深井”的治学方法,做这些事情总想“竭泽而渔”,总想竭力弄清每一个事实。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宋代志怪传奇时,在天津申请社科资助项目,尽管专家组通过,但最终被天津社科规划办公室的官员们给毙掉了,他们说两三年才研究个宋,题目也太小了,报个“中国文言小说史”还差不多。说实在的,现在让我独自写部“中国文言小说史”我都不敢,别说十好几年前了。听过一种说法叫做“攒本书”,利用现成材料“攒”本“专著”,那肯定是“注水猪肉”的垃圾书。学术研究从来就是寂寞的“坐冷板凳”和细心耐心的“磨剑”功夫,可惜现实的许多体制弊病和观念错乱,常常在不断营造浮躁的学术氛围,滋生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

明清民国志怪传奇的研究,除写过几篇论文外,我始终没有进行下去。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好在有学生。在研究过程中我曾设想过一些题目,也作过思考,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弄,都交给学生去做博士学位论文。“有事弟子服其劳”,这是做老师的福气。薪火相传,这更是师生共有的责任。明清民国的志怪传奇史研究,最终还是由学生们陆续完成了。先是占晓勇博士完成《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2003年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继之以陈国军博士的《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2005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2003年张振国由山东师大中文系考入南开跟我读博,他主动提出继续做余下的部分。经过三年的辛勤努力完成初稿,

此后又不断增补修改,如今《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即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师生统共长达30年的研究,犹如跑接力马拉松,文言小说研究终于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小说史链条,实在令人欣喜。

这三部著作,由于时代不同、内容不同以及个人才性和文风的不同,自然各有特色。不过我以为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重视小说史料最大限度的发掘和清理,二是重视从小说内部自身运动及外部时代影响来探寻、阐释和概括小说创作的发展变化。陈、占二书的情况这里不必再说,我在给他们分别写的序中已有过简要说明,这里只就振国此书来略作评说。

晚清民国的时间跨度是从道光后期到民国后期(1840—1949),长达110年。振国依据自己的调查统计,此期志怪传奇小说集的现存总数多达164部。这个数字比有关著作反映出的最大数字还多出60多部。这个数字的得出,可说是“八年辛苦不寻常”,此中饱含着振国的勤奋和毅力。而当想到他多年奔波于各地图书馆访书时,此中实际也饱含着一个穷学生的困顿和焦虑。——这一点,可看此书的《后记》。

最大限度掌握材料是研究的基础,而又是相当困难的。唐宋以前的小说作品清点和查找相对容易些,因为有书目有丛书,相对来说难的是小说辑佚,包括佚文的搜集和考辨。而晚清民国的文言小说,大量作品没有著录,也没有丛书收录,印本、稿本分散在各处,或者连载于报章,盘点清楚谈何容易。但如果不能比较充分地掌握这些资料,小说史的描述肯定会缺少某些环节甚至是重要的环节,从而留下缺陷。在资料的搜集上,振国下了很大功夫。不仅是作品搜集多多益善,还有作品的各种版本及作者的传记资料也力求尽量完备。就拿为学界所忽略或很少关注的民国来说,振国掌握的各种文言小说创作集和编纂集就多达70多种。

其次,小说史的研究建立在作家作品的考证上,这是另一个基础。这依赖于研究者的学识和眼光以及对资料的占有。在这方面,诸凡作者生平事迹、创作过程、作品产生时代、版本、篇目等,振

国都依据已知的和自己掌握的材料悉心加以考证。例如《客窗闲话》作者吴炽昌、《闻见异词》作者许汶澜、《翼骊稗编》作者汤用中、《器器琐言》作者储仁逊的生平,解鉴《益智录》、邹钟《想当然耳》、宣鼎《夜雨秋灯录》的版本,如此等等,考证均称翔实。我尤其欣赏的是对王韬《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中部分作品著作权的考辨,用力甚深。

小说史的撰写,应当具有鲜明的历史感。一部小说史绝不是作品的静态铺排。小说发展的段落划分、小说自身发展的承接变化、时代变迁的影响和投影,这些都是所谓历史感的表现。这种历史感是需要贯穿始终并大力强调和突出的。

振国此书将一百多年的晚清民国时期志怪传奇小说的发展脉络,分为六个阶段展开考察和论述。他在章节标题中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每个阶段的特征,比如第一阶段道光后期延展期的“曾经沧海与盛世流韵”,第二阶段咸丰低落期的“内忧外患与乱世文心”,第三阶段同治复苏期的“中兴气象与回光前兆”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分期紧密扣住时代和创作的变迁,着眼于时代和创作的互动关系。具体说他并不把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当作一个泛泛的背景,而是竭力探寻时代因素对作家思想、心态乃至生存状态的深入影响,探寻时代因素在作品创作中的渗透和反映。同时,小说自身是有传统的,无论对前人作品持什么态度,后人都离不开前人的笼罩,后人都是在对前人创作的解读、评价中迈步的。因此把握小说发展的内在因素,从传统链条中考察后人在借鉴或模仿、发扬或反拨、前进或倒退、守旧或创新中显示出来的个人风貌,考察后人的小说审美观和价值观。这方面振国也是做得较好的。

关于前一方面,我以为在论述第四阶段高峰期,即从光绪元年(1875)到1900年庚子国变的光绪前中期这一“桑榆晚景与末世辉煌”时期时,是做得比较深入全面的。他从上海中心城市地位的彰显、印刷技术的提高、文学报刊和小说杂志的兴起、稿酬制度的萌芽和报人作家的产生、商业利益刺激下的盗版和剽窃现象五个方面论述此期小说家的人文环境,这是紧密结合此期作家的创作生态和作

品特征作出的时代探求,从而为作家创作的分析提供了视角。

关于后一方面,应当是小说史的主体,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作用,都得回到小说本身。晚清民国文言小说作家面对的传统是悠久而深厚的,他们面前不仅有清代的《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还有更为久远的汉魏六朝志怪、唐宋传奇以及明人作品。这些古人作品在有清一代也是广泛流传的。不仅明人编纂的《虞初志》、《艳异编》、《剑侠传》、《情史》等等在清代继续流行,清人也常编纂刊印前人作品,如乾隆间《唐人说荟》、《龙威秘书》,晚清《艺苑摺华》、《无一斋丛钞》、《古今说部丛书》等等。这样,自古以来的大量优秀文言小说作品,就成为晚清民国小说家学习、模仿乃至抄袭的对象。这样,考察小说家在小说传统中的自我表现,也就成为小说史撰写者的重要任务。

振国对各阶段作家创作的分析评价,我以为是基本把握住了在小说史视野中实行作品评析的批评角度和尺度的。批评涉及文体、题材、艺术表现、思想价值等,注意作共时性或历时性的纵横比较,阐述和概括其个性特征和得失优劣。我特别注意到的是,他的批评注意实事求是,如鲁迅所说,“坏处说坏,好处说好”。他经常作负面批评,比如说解鉴《益智录》模拟因袭《聊斋》太过,亦步亦趋,缺少独立自主的创作精神,韩邦庆《太仙漫稿》大多数作品在求奇求变的过程中陷入违背常理的误区,都客观公允。说实在的,作品评价不是念悼词和打广告,尽挑好话说。有这样的倾向,研究某个作品喜欢拼命拔高,若说它不好,似乎自己也掉了份,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还要指出一点,本书的一个特色是以时间为经,以地域为纬来安排架构。振国在书中说:“通过晚清民国时期各个阶段志怪传奇小说作家作品分布地域的差异,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各地的文化发展以及社会的治乱、经济的盛衰对作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思路得自梁启超的理论,也是有意识对时下重视地域文化文学研究的学术风尚作出呼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地域也有一个地域的文学,自古如此。不同地域,历史、风物、文化积

淀、风俗习惯、人情世故、民众性格、文学传统有所不同,即在同一时代,政治生态、经济状况、生活环境、思想风潮也会有各自的特殊性,这些都会造成文人创作的某些差异,例如创作动力、题材选择、素材来源、审美取向等等的差异。因此从地域角度审视小说创作,不是简单地把同时代的作家按地域组合在一起,而是寻找和发现同地域小说创作的相似点,以及它与其他地域小说创作的差异性。无论是相似还是差异,都包含着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内。对文言小说创作来说,做这样的分析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同一地域的小说家很少形成一个相互关联或呼应的创作群体,或者形成一个流派,要发现它们的共同性和与其他地域的差异性,并非易事。因此振国主要还是着眼于地方社会的治乱、经济的盛衰对小说创作的盛衰多寡所产生的影响,至于地域共同倾向,也谈到同治间的广东因果劝善志怪集的大量出现。但我以为从地域角度考察小说创作还有扩展与深化的很大余地。比如以王韬为代表的海派报人作家群,是不是这批聚集在上海滩在报刊上发表小说的作家,创作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点?再如,天津李庆辰《醉茶志怪》,振国说地域以天津为主,天津储仁逊《器器琐言》,其地点以京津为主,那么作品中的天津地域色彩就应当予以阐发。

振国此书,无论是对中国文言小说史研究还是晚清民国小说史研究,都是一个很好的贡献。晚清文学研究,历来关注于通俗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受到漠视,民国文言小说尤甚。自然,晚清民国的政治小说、谴责小说等是新时代的新兴产品,给予高度关注是绝对必要的。然而延续了两千几百年的文言小说此时仍然大量存在,创作者和阅读者热情不减,仅此一点就不能对之等闲视之,更何况,如振国所说,“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文学价值远在多数庸滥直白的政治小说之上”。这里仍该回到我前边说过的话,就是对文言小说不给予充分重视,小说史的描述就是残缺不全的。不管别人如何理解,振国认定了自己的选择,并作了不懈的努力。或许可以这样说,惟其不受重视,也就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也就能增加著作的原创性和学术份量。

振国毕业后在安徽黄山学院任教，今年又进入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展研究。元人傅若金《送张闻友游湘中序》云：“士之游必之通州大邑者，岂徒极登览之胜，角声利之雄哉！观乎山川人物之富，以发其气，益其见闻，必有进于道者矣。”南京大学有很好的学术资源和图书资源，振国今后赳赳然有进，予有待焉。

2010年11月17日

写毕于南开大学文学院

目 录

序	李剑国 (1)
绪论	(1)
第一节 志怪传奇小说发展史略	(1)
第二节 晚清民国志怪传奇研究概说	(10)
第三节 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的发展脉络	(13)
第四节 晚清民国志怪传奇集的地理学考察	(16)
第一章 道光后期志怪传奇集的延展:曾经沧海与盛世流韵 (1840 — 1850)	(20)
第一节 贵州范兴荣《啖影集》与陈庚《笑史》	(21)
第二节 道光后期江浙志怪传奇作家作品	(32)
第三节 其他地域的志怪传奇杂事集	(59)
第二章 咸丰朝志怪传奇集的低落:内忧外患与乱世文心 (1851 — 1861)	(64)
第一节 咸丰间志怪传奇创作衰落的原因	(64)
第二节 安徽潘纶恩与《道听途说》	(67)
第三节 陆长春《香饮楼宾谈》及其他浙江作家作品	(70)
第四节 孙兆淮《花笺录》及其他江苏作家作品	(74)
第五节 北方作家笔下的志怪传奇集	(78)
第三章 同治间志怪传奇集的复苏:中兴气象与回光前兆 (1862 — 1874)	(92)
第一节 安徽许奉恩《里乘》与方浚颐《梦园丛说》	(94)

第二节	江西邹钟《想当然耳》与李熙龄《冰鉴斋见闻录》	(108)
第三节	同治间江苏作家的志怪传奇集	(115)
第四节	浙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与滇南段永源《信征 全集》	(125)
第五节	广东因果劝善志怪集的大量出现	(128)
第六节	山东解鉴《益智录》与直隶边厚庆《旅居笔记》	(132)
 第四章 光绪前中期旧体志怪传奇集:桑榆晚景与末世辉煌 (1875—1900)		
第一节	光绪前中期志怪传奇创作高潮再起的原因	(143)
第二节	宣鼎《夜雨秋灯录》及其他安徽作家作品	(150)
第三节	以王韬为代表的海派报人作家群	(170)
第四节	津门李庆辰《醉茶志怪》与储仁逊《器器琐言》	(203)
第五节	光绪前中期江苏作家的志怪传奇集	(219)
第六节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及其他浙江作家作品	(236)
第七节	四川丁治棠《仕隐斋涉笔》与陈骧翰《骇痴谑谈》	(249)
第八节	山西李澍人《广梦丛谈》叙考	(255)
第九节	其他地域的志怪杂事小说集	(261)
第十节	王用臣《斯陶说林》及其他纂辑体志怪传奇集	(264)
 第五章 清末民初志怪传奇集:守中求变与变中求生 (1901—1919)		
第一节	易代之际志怪传奇生存背景分析	(270)
第二节	林纾的旧体志怪传奇集	(277)

第三节	吴趼人志怪传奇集的功利性与谴责性	(288)
第四节	李涵秋及其他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志怪传奇集	(293)
第五节	清末民初的“聊斋”体志怪传奇集	(305)
第六节	清末民初其他志怪传奇杂事集	(318)
第七节	清末民初纂辑体志怪传奇集	(323)
第六章	民国中后期志怪传奇集:残延消逝与精神涅槃 (1920 — 1949)	(341)
第一节	旧体志怪集的残延和传奇集的隐逝	(343)
第二节	民国中后期纂辑体志怪传奇集	(357)
结 语	志怪传奇精神在新文学中的延续	(363)
主要征引和参考书目		(366)
后记		(378)

绪 论

第一节 志怪传奇小说发展史略

“志怪”一词,最早见于《庄子》,《逍遥游》中说:“齐谐者,志怪者也。”成玄英“疏”云:“志,记也……齐谐所著之书多记怪异之事。”唐陆德明“释文”又曰:“志怪,志,记也;怪,异也。”^①“志怪”和小说发生直接联系,始于六朝,就是许多小说都以“志怪”为书名,如孔约、曹毗、祖台之、许氏、殖氏等等都作有《志怪》,类书等还引有《志怪录》、《志怪集》、《杂鬼神志怪》等,梁元帝萧绎《金楼子》也有《志怪篇》。由于诸家《志怪》纷出,这就有可能使“志怪”变成一个概括一般志怪书的通称,《晋书》卷七五《祖台之传》云祖台之“撰志怪书行于世”,“志怪”和“书”连称,含义似乎就是志怪书的类名,而不是用作书名的。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序》则明确提出“志怪小说之书”^②的概念,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志怪小说”作为一种小说分类没有得到响应。直到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二酉缀遗·中》分小说为六类,志怪居其首,进一步赋予志怪以小说分类学上的确切含义。志怪小说的题材特征是虚幻性,主

① [清]郭庆藩辑《庄子集释》,中国书店据扫叶山房石印本影印,1988年,第2页。

② 丁锡根主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01页。

要记载神仙鬼怪及其他异事,但并非述异语怪者都是志怪小说,例如传奇小说也常常是采用神怪题材。志怪还有着文体体制上的特征,这就是刘知幾说的“杂记”特征,即以“丛残小语”“杂记”怪异之事,因而表现为丛集形式。过去常把单篇形式的《汉武帝内传》等也看作志怪小说,并不妥当,那是单纯从题材上而不是从文体上来定义志怪小说。比较妥当的定义应当是:志怪小说是一种以杂记怪异之事为主的小说丛集^①。

“传奇”一词,始见于唐裴铏以《传奇》名书,宋人开始以“传奇”作为叙写奇人奇事的唐代新体小说的概称。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云:

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二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谈丛、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姑举其重而已。^②

胡应麟将小说划分为六种,其中前二种就是志怪和传奇,但他没说区分标准,从例证看来,志怪是指述异语怪的小说专集,传奇则似乎是指以人事为主的单篇传记。不过胡氏又说:“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俱存,姑举其重而已。”可见胡应麟的认识是模糊的。清代影响最大的小说分类是

① 参见李剑国师主编《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②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2001年,第282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小说家类序云：“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①虽然在廓清小说范围上比胡应麟前进了一步，但同时也将传奇类作品归入异闻，与志怪混为一谈。志怪和传奇的区别不在于题材和外表形式。鲁迅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异，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成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于是时始有意为小说。”^②很明显，鲁迅是从文体角度上、从创作意识和审美特征上来区分志怪和传奇的。

志怪小说经过先秦时期的酝酿、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及隋代达到成熟和鼎盛。唐代志怪小说一脉仍沿六朝志怪的方向发展，并且在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上超过了六朝。而另有一部分作品则在篇幅上、藻饰上、架构上超越了六朝志怪而成为“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传奇小说，这无疑在篇幅简短的志怪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传奇是志怪的变体与发展，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说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③。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也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转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④指出传奇与志怪的一个突出区别就是它的主观虚构性。李剑国先生在《唐稗思考录》中说：“当志怪小说按照人情化、兴趣化、诗意化的美学标准来重新设计自己，并讲究作品的精致化、文章化时，它就变成了传奇。”^⑤

宋代的志怪传奇小说在数量上与唐人差不多，并且还出现了像《夷坚志》这样集大成的鸿编巨制，但在艺术上，与唐传奇相比却稍逊一筹。对此，胡应麟评论说：“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

①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5年，第1182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第59页。

③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8年，第135页。

④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2001年，第371页。

⑤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采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里儒野老之谈故也。”^①鲁迅则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②宋人在文言小说创作上,又走了一条同诗文创作一样的路,虽然力求突破,可无法走出唐人光环的笼罩,缺少了大唐盛世的雍容洒脱,剩下的是谨小慎微的亦步亦趋。

金元时期,志怪传奇创作进入低谷,程毅中先生《宋元小说研究》将元好问的《续夷坚志》作为金代唯一的一部小说集^③。现存的元人志怪传奇集以编辑前人小说为主,如吴元复《渤海新闻夷坚续志》、郭霄凤《江湖纪闻》以及佚名的《异闻总录》等,谈不上对此前小说的创新。元代志怪传奇小说最大的成就在于《娇红记》对前人小说体制的突破。宋梅洞《娇红记》写落魄书生申纯在舅舅家期间与表妹王娇娘相爱,受到舅舅侍妾飞红的阻挠,但是暗恋申纯的飞红理解后还是暗中相助他们私通。然而,由于申纯贫困潦倒,舅舅起初拒绝,但后来申纯中进士而同意了。正当王、申准备成就好事时,王娇娘被地方军阀相中,两人最终无法结合,娇娘绝食病死,申纯自缢而亡。死后两人成仙,世人月夜经常在他们分别之处听到他们的私语。应该说,宋梅洞写作《娇红记》对前人是有所借鉴的,故事与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和唐传奇元稹《莺莺传》都有相似之处。宋梅洞在继承同时,又大胆进行了创新与发展,使《娇红记》在艺术上对前代传奇有了新的突破。《娇红记》篇幅达一万七千余字,是文言小说中空前的巨制,其情节之曲折、描写之生动、细节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宋梅洞运用写实与抒情相结合的手法,以舒缓的节奏,对男女主人公的相识、相爱、结合的过程徐徐道来。在好梦成真之后,又安排了各种波澜,制造悬念,

①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2001年,第283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第88页。

③ 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